

古籍保护

专刊

藏书报

2017年2月13日

第3期(总第4期)

本刊主编：刘晓立
版式统筹：常英
联系电话：0311-88643113
投稿邮箱：liuxiaoli0119@163.com

藏书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联合主办

· 业界动态 ·

云南省图书馆 古籍普查项目获表彰

近日，在文化部表彰的2016年文化志愿服务示范活动典型案例、基层文化志愿服务活动典型案例、文化志愿服务团队和文化志愿服务个人中，云南省图书馆的“云南省古籍普查登记”项目和“云南省古籍保护中心文化志愿服务团队”分别入选“2016年基层文化志愿服务活动典型案例”“2016年文化志愿服务团队”，杨利群、赵发员两人入选“2016年文化志愿服务工作者”。

西南大学两部唐宋珍本 完成修复工作

近日，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支持下，历时一年，收藏于西南大学的两部唐宋珍本正式完成修复工作。两部唐宋珍本为《唐人写百法名门论义记》和《文章正宗》。前者为唐敦煌经卷残本，钦有：“江津王氏晓传书斋藏”印，为国学大师王利器先生赠送给原西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的珍贵文献。《文章正宗》原为二十四卷，西南大学所收藏的为卷二十一下半部。

西藏古籍普查首次发现 完整吐蕃时期赞普“御经”

据悉，西藏在古籍普查登记过程中，首次发现了吐蕃赞普曾使用过的“御经”，工作人员表示，这是普查登记工作开展以来，发现距今年代最久远、保存最完整的古籍经书。该经书一共有五部，内部部分藏文手写字体以及作者署名与敦煌文献内容极其相似。目前，这五部“御经”已由专人保管，下一步将是进行数字化管理。

孔府文献被纳入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国家图书馆与山东省曲阜市文物局日前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双方将孔府文献纳入“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框架，在孔府藏书出版、孔府档案揭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古籍保护人才培养等方面将开展系统化合作。据了解，作为孔府文献的重要代表，曲阜孔府文物档案馆现存《孔府档案》9000余卷约25万件，古籍图书6000余部4万余册，古籍雕版4400余块，碑帖拓本1900余套4000余件。

传承之路永无终点

——文化学者葛芸生为『古保』事业奋力前行

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即将走过十周年之际，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正式启动摄制纪录片《古籍今传——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十年纪行》，该片是以视频为载体对我国近十年古籍保护事业的简要回顾，同时也是对中华古籍保护计划进入“十三五”期间的展望。

纪录片《古籍今传——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十年纪行》由文化学者、纪录片制作人葛芸生领衔，日前已经采访了百余位专家学者与奉献在一线的古籍保护工作者，走进十省区数十处古籍收藏保护单位，积累了200个小时的真实影像。

对于葛老来说，这一切，不只是为了做一个节目，毕竟古籍保护的资源采集远胜于单一作品，保护比制作更为重要。他说：“走访时我更企盼各地能重视古籍保护全程‘进行时’的影像积累，它将成为古籍‘活起来’的、第一手的、不可再生的、兼备存储与传播双重持续功能的宝贵资源。”

(详见第11版)

国图藏品故事



汉字的故事



青海古籍保护的一次全面展示

——记“册府千华——青海省藏国家珍贵古籍展”

□ 晴 雪

地处青藏高原、华夏西北腹地的青海，为长江黄河之源、古代丝绸之路要冲，所谓“戎马之郊，关河之冲”，资源丰富，民族众多，藏、回、土、撒拉、蒙古、满、哈萨克等少数民族与汉族一起，谱写了青海历史文化的动人篇章，也产生了众多古代典籍。这些古籍是青海各民族的精神文化遗产，反映了青海民族交流融合的历史轨迹。据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掌握的数据，青海省有16家古籍收藏单位共收藏各民族文字古籍3万多部，其中，青海省图书馆、青海省藏医药文化博物馆、青海大学医学院图书馆、玉树藏族自治州东仓大藏经珍藏馆等10家单位和个人的67部古籍入选了前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包括汉文古籍58部，藏文古籍8部，阿拉伯文古籍1部。

2016年年底展出的“册府千华——青海省藏国家珍贵古籍展”是西北地区珍贵古籍的一次重要揭示，也是青海省古籍保护工作的一次系统展示和总结，对展示青海各民族所创造的灿烂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目前已经在湖北、湖南、广东、山东、辽宁等地开展了以“册府千华”为标志的国家珍贵古籍和保护成果展，受到各地民众的热烈欢迎。其目的就是要激发各地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对于本地所藏珍贵典籍的兴趣，加深对家乡地域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增强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同时使民众了解古籍、热爱古籍，积极参与古籍保护工作。专业保护、大众参与，是古籍保护事业在未来结出硕果的必由之路。

首亮珍贵古籍“家底儿”

“册府千华——青海省藏国家珍贵古籍展”，是青海历史上首次举办珍贵古籍展，共展出青海省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古籍30部、青海省图书馆馆藏珍贵古籍120部、馆藏历代名家和青海名家字画55轴，以及碑帖拓本、地方文献特藏等，展览还对古籍保护基础知识和青海省古籍保护成果进行了系统介绍。

参展的30部国家珍贵古籍有明刻本16部、清刻本14部。万历年间闵其伋刻《春秋左传》十五卷是闵刻传世最早的朱墨套印本。闵刻朱蓝墨三色套印较少，这次展出了《楚辞》和《苏文忠公策论选》十二卷两种，后一种为朱、蓝分印，茅坤、钟惺批评；另一部朱墨套印《柳文》七卷，前有茅坤题“柳州文钞印”字样，是茅坤遴选唐宋八大家文的缩影。其他明本多为正德、嘉靖、隆庆本，如正德十年刊《洪武正韵》（另一种为嘉靖衡藩刻蓝印本）、《大明正德乙亥重刊改并五音集韵》等。嘉靖本中，薛应旂于嘉靖四十五年自刻《宋元通鉴》一百五十七卷弥足珍贵；《皇明名臣经济录》在清代被禁毁，存世量稀少；明徐氏东雅堂刻《昌黎先生集》以号称“神品”的宋咸淳廖莹中世经堂刻本覆刻而成，覆刻技术据说“毫发不差”。加之多种套印、精刻的清代内府本，令人感受到古代书籍文化优雅深厚的底蕴。

青海省图书馆所藏明清善本和碑帖拓本，这次也有较大规模展出。善本古籍主要是史部、集部经典。其中众多名家别集精善本的展出，既凸显该馆藏书特点，又能亲近大众观感，效果尤佳。展览还通过展板形式，对古籍版式结构、善本概念、古籍分类、各类版本名词等知识进行系统介绍，与展品相结合，便于读者更好地了解古籍。这是策展人员力求贴近民众、“使古籍活起来”的努力。馆藏碑帖拓本约800种1200余册（件），这次展出了部分珍稀拓本，如1942年出土于青海乐都县老鸦城西白崖子的东汉光和三年（180）刻《三老掾赵宽碑》精拓本，就是不可多见的西北名碑。

日新月异的古保工作

青海省古籍保护工作长期以来受到政府、古籍收藏机构、宗教机构和民间人士的高度重视。新中国成立后，青海省各级政府通过各种形式，使大量散落在民间的古籍入藏图书馆、博物馆、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等公藏机构，成为古籍保护的主要对象。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后，青海省古籍保护中心开展了古籍普查登记、珍贵古籍抢救、古籍开发利用等一系列古籍保护工作。目前16家古籍收藏单位中，已有13家完成了古籍普查登记工作，提交数据8094部。《青海省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

正式出版，收录古籍5109部，内含善本637部10125册，实际上已经达到“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评审数量要求。

这次展览还用较大篇幅向读者介绍了青海省抢救保护珍贵古籍的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撒拉族《古兰经》和藏文东仓《大藏经》。

在青海省古籍普查登记中，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街子清真大寺宝藏的一部13世纪前阿拉伯文写本《古兰经》进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成为首部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外文文献。这部《古兰经》出自中亚撒马尔罕的撒马尔部落（撒拉族前身）。元代后期，部落领袖尕勒莽和阿合莽兄弟率领同族18人到东方寻找乐土。这部经书就由白骆驼负载，随部落东来，最终落户青海循化，一直作为圣物由撒拉族执掌教法的“尕最”掌管。民国间，这部《古兰经》曾在叙利亚国际展览会上展出，引起轰动，阿拉伯史学家、文物专家盛赞它是“今世少有的珍本”，是世界上三部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古兰经》抄本之一。解放后，《古兰经》辗转多地保存，最后由政府落实政策，安置在撒拉族宗教殿堂街子清真大寺，延续世代守护的传统。令人欣喜的是，2010年，在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韩则岭拱北又发现了一部11世纪前以阿拉伯文抄写的《古兰经》，由东乡族世代宝藏。该经内容完整，开本阔大，彩绘美观，书法优美，是少数民族珍贵古籍的重大发现。

2010年4月14日，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发生大地震。抄写于公元十至十一世纪的藏文东仓《大藏经》被埋，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经军民协力抢救，被埋14小时的《大藏经》全部抢救出来。之后，国家又投巨资修建了集保护、整理、研究为一体的珍藏馆。2015年，全部大藏搬入新馆妥善收藏，成为全国古籍保护的典型范例之一。

意犹未尽，更多期待

不过，这次展览在充分展现青海作为古丝绸之路要道、在连接东西方文化所起重要作用方面，还有一些让人意犹未尽之处。青海历史上曾编纂过17种地方志，其中宋《青唐录》、明《（嘉靖）西宁卫志》、《（万历）西宁卫志》、清《（道光）大通县志稿》原本都已散佚。《（顺治）西镇志》（又名《西



整齐存放的东仓《大藏经》卷本。

街子撒拉族清真寺两本无比珍贵的《古兰经》。

宁志》）顺治十四年刻本只藏天津图书馆；《（康熙）碾伯所志》稿本藏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乾隆）循化厅志稿》稿本藏苏州图书馆；《湟中杂记》稿本藏甘肃省图书馆；《（光绪）采录大通县乘佚稿》稿本藏温州市图书馆；《青海调查事项》藏国家图书馆，这次展览无缘得见。此外，青海省图书馆藏有的大量西北珍稀地方文献，如《（康熙）碾伯所志》抄本、《（雍正）青海》抄本，《（乾隆）西宁府新志》刻本和《（光绪）丹昂新志稿》稿本等文献，本次也只展出了《（光绪）丹昂新志稿》稿本。

除方志外，青海省图书馆还存有《甘肃西宁府大通县光绪拾肆年带征光绪叁年缓征粮草总散数征信册》《甘肃涇

州直隶州应征光绪拾肆年地丁银粮草总数民欠未完数征信册》等众多反映西北地区政治、经济、文教、武备诸方面的档案文献，以及清顺治七年刻本《汇辑舆图备考全书》等稀见山川、水道、道里等地理类志书，这次大都未能展出。

值得一提的是，青海省图书馆藏书中还有《土耳其志》《爪哇志》《西比利亚志》《天演论》等不少近代以来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著述译作，这些书籍收藏在人们印象中的河湟苦寒之地，实在令人惊讶。但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丝绸之路故地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如能加以揭示，会促进读者认识青海古往今来在“一带一路”战略布局上的特殊地位。

传承之路永无终点

——文化学者葛芸生为“古保”事业奋力前行

□本报记者 刘晓立

藏书报：做这个纪录片，要深入其中，让专家学者畅谈难题和心声，您有什么诀窍吗？

葛芸生：如果从新闻工作的角度，采访需要提前做选题和提纲，但实际上，我从来不喜欢采访时拿着提纲一条条地去问答，因为我要对方说的并不是我设计的主题，而是他真正想要说的。有一次，我在上海采访一位资深专家，才说了一句话，即古籍保护归根结底要做好从事这项事业的人的保护，他就滔滔不绝地和我聊了起来，话题中不乏很尖锐的批评意见。尽管他今天说的话，在我的节目里只有几十秒钟，但我并没有打断他，而是专注地聆听他内心最真实的感受以及有困惑的话语。严格来说，我以聊天的方式有违采访常规，但无论权威还是基层员工，给予我的就是古籍保护有苦有乐、有血有肉的实感，令我为之流泪、为之欢欣。

古籍保护归根结底是对人的保护

藏书报：为什么说古籍保护的关键是对从事这项事业的人的保护？

葛芸生：举个例子吧。我去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采访，在那里不仅见到了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院长肖惠华，还跟几个毕摩先生有了一番交流。毕摩是彝语音译，“毕”为“念经”之意，“摩”为“有知识的长者”，他们神通广大，学识渊博，主要职能有念经、司祭、行医、占卜等；从文化传承上他们整理、规范、传授彝族文字，撰写和传抄包含宗教、哲学、伦理、工艺、礼俗等典籍。

在贵州，水族称神职人员为先生。水族先生跟毕摩一样，临终前如没有合适的继承人，就会拿经书殉葬，所以，具有古籍资质的经书存量有限。目前经抢救，有的被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有的在申报世界记忆遗产。但在申报时必须把经书翻译出来，让公众知道这些经书的意义和价值。我在荔波遇上五六位水族先生正在做经书翻译，这些先生此前被当作封建余孽，受过不公正的待遇，如今出来当翻译，并不计较钱的多少，而是要给本民族文化留个根。他们说，经书上的水族文字，往往一个字会有多个形、音、义。几位先生一起翻译，不同意见的争议不绝于耳。我在现场受到启发，倘若把他们的争论全部记录下来，其价值将历久弥新，有可能是绝响。因为，上一代先生在口耳相传时，经书上许多内容仅仅以文字为表意符号，并不是精准的记述。所以一位先生他走了，他的东西就没人能懂了。

就我所知，我国有19个少数民族是有文字的，但是能够阅读和理解少数民族文献的人现在少之又少，古籍保护面临的难题，并不在藏量多不多，而是要重点保护那些能读懂的人，其中首先是那些先生和毕摩。

藏书报：少数民族文献是不是需要特别保护？

葛芸生：是的。保护那些记载着各民族独自语言、文字的古籍，就是在保护各民族的多样性。民族平等是不论人

口多寡的，更何况少数民族的文献体量一般不大，传承条件差，人才稀缺，现存古籍还有需要靠毕摩等神职人员的释读才能弄清楚内涵。正如贵州民族大学教授、水族文献专家潘朝霖痛心疾首地和我讲：这些持有文献的神职先生要是一个人不在了，倒掉的就是一座图书馆；图书馆倒了可以重建，人走掉的损失是无可挽回的。

汉文古籍在十年普查登记中有三百多件新发现。其中大量是从原本收藏的库房里找到的，似花开二度，似遗珠落盘。相对来说，少数民族文献原先收藏不足，散在民间的居多，存放环境不利，如果再不抢救，可能就没了。接下来，少数民族文献的保护就像精准“扶贫”一样，应该花大力气去抢救与保护。不然的话，少数民族的文化变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藏书要有“三善”

藏书报：作为藏于民间的古籍，您认为应如何保护？

葛芸生：按照古籍属于“天下之公器”的理念，不管公藏、私藏，都应该能为所有人所用。很多前辈藏书家都纷纷把个人藏书捐献给了国家，如郑振铎、周叔弢、顾廷龙、赵万里等先生，他们藏书不是为了个人增加财富，而是以藏书来服务国家和民族的。

我在苏州采访了一位旧书店的老行尊江澄波先生，现在90多岁了，一辈子与古籍打交道。他的弟子有的是拍卖公司的老总，想从他那里拿点古籍去竞拍，他一件都不给。面对价值连城的“过云楼”原藏量75%的善本典籍，他却无偿地推荐给南京图书馆收藏，自己靠微薄的养老金过着清贫的生活，因为他最不愿意看到古籍的散亡佚。

我在香港两次拜访收藏印谱的松荫轩主人林章松先生，他藏有一千七八百部印谱。著名版本学家沈津用两句话介绍林先生：您要用他的书，一个字“请”；您想拍几张照片，两个字“请便”。收藏家韦力的评价则是：“我叹服林先生的印谱，收藏从质量上讲已经很高；从数量上讲，更是中国第一。”令我最感动的是，有一半印谱林先生自己完成了编目与撰写提要；他的习惯是只藏不售，但始终坚持无偿服务于公众。他长年一丝不苟地利用博客，连续以数百万字的专文和海量图像，公示自藏的印谱。

个人藏书家愿意不愿意捐献，诚然是自己的事，但我一直认为：收藏要有“三善”，即善心、善藏、善用。人生苦短，给书找到一个最佳的安置场所应被视为一种功德。

古籍保护可在五方面继续提升

藏书报：看了这么多，访了那么多，您认为古籍保护工作还有哪些可提升空间呢？

葛芸生：综合受访者给我的教诲，目前粗浅的领会是，接下来古籍保护要在国家关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的顶层设计下，注重从科学化、国际化、数字化、学术化、产业化五个方面，努力提升。

科学化，是指搭建古籍与当代科学并驾齐驱的通道。时代在进步，古籍保护不能停留在手工行业阶段，必须将现代科学融入其中。在这方面，我认为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做得非常好，他们将古籍保护提升到跨学科融合的高层次，去年又有6位分别来自海内外从事生物、化学、物理、材料等多学科的博士与博士后加盟古籍保护研究院，同时又聚集了复旦校内的科学院院士、教授，一起攻克古籍保护领域的难关，解决“短板”。为此，启动的古籍用纸、用墨等材料的项目，即获得广州市前市长陈建华的首肯与研发费用一千万元，由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和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共同研制解决“纸寿千年”难题。他希望未来再印《广州大典》时，能用上寿命更长、科技达标的优质纸。而这样的科学研究，必须要有先进机器、尖端人才，且进行一次又一次较长时间的科学实验。我在现场有幸见到首次检测的样品纸，并聆听到中科院院士、高分子和材料学家杨玉良先生的评点。接下来，人工试造的纸还有待对野生原料如草根、树皮的进一步筛选和种植养有的过程，才可能批量生产。在科学引领下，从纸张原料的种养基地，到古籍用材的科学检测、古籍修复与存储涉及到的大量设备与材质、古籍保护人员的培训与学科建设、古籍数字化与传播技术的广泛应用，都将需要花大力气来做。

古籍保护走向国际化，这是我走访中颇受触动的一个话题。通过近些年对海外珍藏中华古籍的调查，已大体清楚海外哪些国家馆藏着多少中文古籍。出乎意料的不仅是数量之众，而是如此多的中文古籍都在“睡大觉”，二三十年甚至半个多世纪也不见动一下。主要原因在于海外缺人手，缺少知晓中华古籍的人。这些海外古籍隔断了它原有的根脉联系，但它们确实确实是中华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所以，需要交流。我在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听到很多很好的中外交流的经验。显然，这种交流不仅停留在海外古籍数字化及影印出版上，更需要加强人才之间的交流。目前，国内有一批称职的古籍保护人才，他们可以“走出去”，前往所需国家进行中文古籍的修复与编目，同时也可以把海外学者“请进来”，举办国际论坛，吸收国外先进的古籍保护科技成果。

古籍保护必须加强数字化进程，已属共识。我感到数字化的路还很长，不会一蹴而就，也不会一帆风顺。尽管，扫描录入是最基础的一步，但如何让千千万万人平等享用数字化的成果，才是更为困难的关键一步。目前数字化还未能真正实现畅通无阻，搜索问题是需要迫切解决的。有人批评一些上传数据有误，这类失误应尽量避免的，然而网络本身包含有纠错功能，所有人都可对某个信息提出不同意见，既有助于形成



沈燮元老先生向葛老讲述古籍。

开放的学术氛围，也促进“小众”的古籍保护得到“大众”的参与。数字化本身一方面便利了读者阅览，另一方面也帮助了古籍管理研究者，是一项令双方受益的工程。

无论在图书馆，还是在藏书与读者相对集中的高校，古籍保护如何迈向学术化之路日益引发关注。鉴于读者选择性需求的强化和阅读方式的跳转，古籍阅览室如何适应呢？古籍服务人员的学术水平，一定程度会制约提供服务的质量。故不能仅仅把古籍保护当做简单的职业，而是要视为一门科学。可喜的是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已与几所高校进行古籍保护学科的筹建，从培养专业硕士、博士等高层次人才着手，逐步使古籍保护成为专门学科，培养目前从业的和更多未来从业的优秀人才。

资金缺乏，是受访者最不愿启口跟我说的话题。200多天所见所闻，多次引起我到古籍保护要不要、能不能尝试产业化的思考。平时我跟一些朋友聊天，他们感叹，我们少建一座大厦、少修几公里高速铁路，省下的钱用在古籍保护这块沃土上，就能做出很多“改善土质”“花开二度”“百年树人”的功德善举。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目前，国家倡导的文化创意产业，正为古籍保护的产业化奏响了序曲。

余生做好一件事

藏书报：对您来说，做“古籍保护纪录片”意味着什么？

葛芸生：21世纪初，我给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费孝通老先生做了一部纪录片。费老亲切地跟我说：“我身边只剩十块钱了，我要好好想一想买一件什么东西？”当时我没能领会，心想费老说得不会是钱吧。稍后才意识到费老的言外之意是，要珍惜余生去做一件有益国计民生的事情。这就是费老后来向中央提出的关于“中国水资源的调查与治理”项目。

我在云南贵州走访时，先后听到多起费老关注与抢救少数民族古籍的感人事迹，给我又一次强烈触动。我也七十有五了，身上也不清楚还剩几块钱。我要牢记费老的教诲，余生做好一件有意义的事，倘若有缘的话可能就是古籍保护了。

前年我发起一个“古籍流辉”志愿者群，希望能以镜头和行知，将自己在亲近古籍中的点滴感受，传递给更多的人，与更多的人一起从古籍中共享智慧，滋养生命。



这次在武汉寻找柯逢时的藏书楼，陈琦兄出力不少，不仅动用了各路朋友，还找来了柯逢时的玄孙柯立志先生。立志先生性格属于沉默寡言型，曾在电邮里提出，希望我在写文章时，直接称呼他为“小柯”，于是只好从命。

仿古建筑遍布 柯氏息园无痕

柯逢时的故居处在武昌的都府堤一带，而今这一带遍布仿古建筑，还有几处重要的红色遗址，我们一路就见到了“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旧居纪念馆和中共五大会址。刚走到会址门口，小柯就发了话：“五大会址门口的这片绿地就是柯逢时故居遗址。”

眼前的这片绿地，看样子占地约十几亩，属于开放式，四周没有栏杆和围墙。在入口的位置，有一块桌面大小的石头，上面用中英文刻着“武昌廉政文化公园”。小柯说，当年因日本人打来的时候要征用，柯家后人就从武昌搬到了汉口，自此再也没有回来。

为什么搬走后就不再回来呢？听到了我的问话，小柯愣愣地盯着我，突然说了一句：“哎，柯逢时辛辛苦苦给慈禧太后打工多年，57岁和66岁时才有两处家业，新军和谘议局的朋友来了，黎元洪、汤化龙好好招待；同盟会的朋友来了，黄兴、石瑛好好招待；地下党来了，董必武好好招待；最后日本人一

柯逢时息园： 书楼无痕，绍裘尚在

□北京 韦力

来，美国人飞机一轰炸，烟消云散，什么都没有了。”

万卷藏书成佳话 红色遗迹作芳邻

柯逢时是清末武汉三大藏书家之一，关于其藏书的来源，历史记载最多者，是他在陕西收购了李嘉绩旧藏5万多卷书。《华阳县志》上就有这样一段记载：“李嘉绩，字云生。藏书三十余万卷，多善本，自编为目，其歿也，家无余财。柯逢时以数万金购所有书而去。”

其实，柯逢时的藏书还有裘曰修旧藏的800多种抄校本。裘曰修是著名的四库馆臣之一，据说他当年为了修订四库底本，自己购买了许多相关书籍。这些书放了很多年，在清末被广东的徐绍桢买了去。柯逢时听到后，马上给了徐绍桢3万块钱，把这批书收到了自己手中。这批书应该算是息园旧藏中质量最高的一部分，可惜的是，据说在柯逢时去世后，全部被日本人买走了。

关于柯逢时藏书的最后结局，雷梦水在《书林琐记》中有一篇“古书业与近代几位藏书家”一文。此文中提到柯逢时，有这样一段说法：“柯氏卒后，藏书归两子。长子柯某（继文）分得子部、集部，次子柯岳生分得经部、史部。二十年代末，柯岳生之书由北平遂雅斋书店赵智丰购得。其中最珍贵的为《周益国公大全集》五十六册，有黄丕烈校跋，并补钞缺页，周星诒校跋。每册书皮皆有黄氏题字，其后陆损之又手批重校，一批到底，绝精。遂雅斋主人董会

卿视为至宝，索价万元，搁置未售。1956年捐归北京图书馆收藏。”

柯逢时哪来的那么多买书钱？小柯说，因为柯逢时曾被任命为八省膏捐大臣，这是个肥缺，因张之洞的举荐才专设的新职位。柯逢时跟黎元洪的关系也很好，武昌起义后，柯逢时还曾组织绅商成立态度中立的武昌保安社。

今日的柯逢时故居寻找，最让我意外之处，是这个旧居遗址的附近竟然都是红色革命遗迹。小柯说，柯家的确跟当年的革命者有较为密切的交往。1927年大革命失败，汪精卫追捕革命党人，当时董必武就藏在了柯家。

旧址何在成谜团 菊湾门牌为坐标

武昌寻访之后，我刚回到北京不久就收到了小柯的电邮，告诉了我一些相关的史实，也发来了多页他自己收集到的关于柯逢时藏书的来源以及散失的经过。能够看得出，只要有一丁点儿跟柯逢时有关之事，他都会放在自己的文档里，这份认真劲儿，让我佩服。然而，在某封信中，他谈到了柯逢时故居的真实情况：“在武昌都府堤只有三个红色地标：农民运动讲习所1864、中共五大会议纪念馆1913和毛主席旧居，能保存到现在的。我实在不知道确切旧址，最后只好说武昌廉政公园就是旧址，十分惭愧。”

看到了这段话，吓我一跳，然冷静地转念一想，小柯的坦诚让我感到欣慰，毕竟我又知道了一点历史的真实。小柯在信的后面还有这样一段话：

“武昌公园以前是我家的花园，都是传说，因为陈琦给我看了1909年的地图，当时司湖还在，武昌公园那片应该是司湖。还有个可靠的线索：我祖母的同学是地下党，1927年在我家住过，说是延望街50号，可惜当年没有带她去确定一下，她已经故去。”

他的这两段话，反而让我感觉当年柯逢时的旧居其实就在这一带。根据实地探访，都府堤一带面积很小，原来又都是大户人家居住之地，一共也不会有几户人家。如此想来，我们寻找的这一带，确实就是柯逢时故居所在地，并且在都府堤的另一头，就是杨守敬居住的菊湾。按照历史记载，杨守敬和柯逢时曾作为近邻，交往较为密切，而今菊湾只剩下短短的一小段，但因为有门牌在，也成为寻找柯逢时故居的坐标点。



1937年，柯立志祖母站于戏园前。

川西藏书话贲园（二）

“贲于丘园”，其典出自易经

□四川 王嘉陵

贲园书库为一座两层砖石结构的石库状小楼，作为严氏宅第贲园的一部分，位于今和平街，自民国3年（1914）开始破土动工，此楼已过百年，严氏故居也已面目全非，可贲园书库依然存在。

贲园书库造型简洁，气韵厚重，建在三进院落最后面的院里，坐北朝南，长约六十尺，宽三十尺。小楼为青砖建筑，歇山式屋顶，双层檐角，出檐粗犷，二楼上端有一石刻匾额，题写“书库”二字。书库四周开有方形小窗户，楼窗左右对称，小巧精致，中间有阳台；墙体之上，所有窗户都装有隔水板，屋檐下修有腰檐，小窗之上设有气窗，楠木制成的门窗皆用铅皮包裹，防潮、防火、防晒都有周全考虑。底楼筑有地下室，大约与恒温、藏物都有关联。楼基座上有一些浮雕，雕刻着卷草白云，青狮和象。

1951年，严氏藏书连同贲园书库和宅第售与国有，同时严谷声将自刻版片若干捐公，此宅遂成为四川省图书馆中文部。四川省图书馆已故研究员田宜超先生参加工作之初曾暂居于此，后来撰

文述及：“严氏故居，旧多花木，数亩之间，奇葩吐芬，嘉树涵碧，其昔日之主人名之曰贲园，取《周易》‘贲于丘园’之意也。”陶亮生曾任严谷声子女的教席，记述：“书库建在花园中……高大宽敞，外凿石，通户牖，为石库状，周围种植银杏、幽篁，冬暖夏凉，清新雅洁。”这大约可勾画出昔日贲园及其书库的全景。

关于“贲园”的字意，廖平也讲取自《周易》贲卦，曰：束帛戈戈，贲者西方之卦。“贲”读bì，四声，有将“贲园”读作fēn yuán者，应为误读。“贲”有文饰之意，读作fēn时，已没有此意。孔子曾占得贲卦而并不满意，有人说孔子是想占得能满足其政治抱负的卦，而不欲得到仅以《诗》《书》传世的卦。不足信，但用以说明“贲”字的含义是可以的，而“贲”的读音，应取决于它的用法。

今天，时过境迁，严宅昔日的三进院落已然了无痕迹，水泥建造的楼群后面，所幸书库依然保留下来，被囚禁在一小片天地里，两株枝干磅礴、直插入

云的古银杏树之下。以书库功能和藏书规模而言，有人将地处川西的贲园书库与江浙一带的宁波天一阁相比，其实并不妥当。天一阁建于明朝中期，距今有四五百年历史，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而贲园书库建于民初，其藏书跨晚清和民国两个时代，要晚得多。

其实，华夏之内可有一比的私家藏书楼是可以找到的，那就是杭州的嘉邨堂。然而以现状相较，贲园书库似乎算不得幸运：嘉邨堂现为浙江省图书馆分馆，园林于外，版藏其中，风采依旧；贲园的藏书还算幸运，入藏四川省图书馆得以收藏和保存，独贲园书库建筑不弃不用，处境尴尬。好在最近数十年内，成都市政府于2001年、四川省政府于2007年分别公布贲园书库为市级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避免了撤除销毁的厄运。但是，保护工作仍然需要加强。

严邀曾为贲园书库自撰对联一副，并请于右任挥毫写出：无爵自尊，不官亦贵。异书满室，其富莫京。这对联应是借贲园书库及藏书言说自己的操守和骄傲。

成都古来为源远流深的蜀文化之囿，曾几何时在荒诞不经的岁月中，也是城市格局和古文物毁坏最惨烈之地。城中，古明王府即清贡院，市民称作“老皇城”，“文革”中数日间被夷为平地，只为建一座颇具政治意义的展览馆；所谓“深挖洞”时，府南河内侧绕城而立的旧城墙被挖，直至荡然无存；各类别致而古韵十足的民居、院落和公馆，也逐年湮灭，几乎都是人为的因素造成。

如今漫游成都，现代造楼千篇一律，很难见到旧时的青砖高墙、石板路和深灰鱼鳞瓦，两江七桥，面目全非，昔日风貌不再。只偶尔残留一点边角余料，让人有点小惊喜，恍若旧梦重温。如今城市商业中心的春熙路北面，清代劝业场背后不远的一条称作和平街的偏街，街上一个被水泥楼盘深锁的窄院里，还有一栋旧式小楼，依旧破败的坐落于此，有近百年的历史。而正是此楼和它的主人，侥幸为后人留下了至今还传存于世的若干千年古籍。